

作家卷

写给妈妈的话丛书



写给妈妈的话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作家卷

写给妈妈的话丛书



写给妈妈

的话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写给妈妈的话:作家卷/杨筱怀主编;《中华儿女》杂志社编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5.8(2009.1 修订)

ISBN 978-7-80094-154-2

I. 写…

II. ①杨…②中…

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4956 号

写给妈妈的话

(作家卷)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 字数 190 千字

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ISBN 978-7-80094-154-2

定价:29.5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组委会名单

组委会名誉主任：程思远、吴阶平、布赫、曾志

组委会主任：李源潮、刘鹏

组委会副主任：巴音朝鲁

委员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王 晨 陈泉涌 杨筱怀

俞贵麟 温愉新 缪 力

评委会主任：巴音朝鲁

副主任：俞贵麟

评 委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于 健 王 晨 王 蒙 王维玲

巴 音 朝 鲁 从维熙 令计划

刘心武 陈泉涌 杨筱怀 周春宁

高江波 高洪波 俞贵麟 贾英华

陶斯亮 韩美林 温愉新 解思忠

缪 力 蔡建光



序

全国青联主席 刘 鹏

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之际,我郑重地向与会的各国代表和社会各界读者介绍《写给妈妈的话》丛书。



前不久,经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批准,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,共青团中央、全国青联主办了“写给妈妈的话”和“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献辞”的征文活动,由《中华儿女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国少年报》四家联合编辑,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就是对这次征文活动的圆满总结。这次征文活动收到了6300件,10000余份来稿。

可以说,文章的作者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层面。有作家、艺术家、社会名流和共和国的部长们,有普通工人、农



民、知识分子、军人和许许多多的少年儿童，有卧病在床的病人，还有正在服刑的犯人。是对母亲的拳拳之心将大家的情感汇合在一起，成为一股爱的洪流，这种情感也是我们对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的最好献礼。

母亲是最伟大的，母爱是最无私、最纯洁的。仔细体味这种母爱是对自己灵魂的一种净化、一种升华。同时，也使我们拥有了一种责任，一种对生我养我的母亲的责任，一种对我们祖国母亲的责任。



目 录

远去了,母亲放飞的手	刘心武(1)
生命有限爱无尽	铁竹伟(14)
多舛的人生无限的爱	解思忠(30)
为孩子活着的妈妈	刘学江(55)
妈妈的遗嘱:我儿不哭	聪 聪(63)
只跪大地只跪母亲	管 桦(70)
母亲远行的时候	杨匡满(79)
未圆之梦	叶文玲(98)
抱着你,我走过安西	毕淑敏(113)
母亲送我们去读书	叶 楠(132)
提笔踟蹰话亲娘	梁秉堃(137)
讲述我的两个母亲	野 莽(151)
我的母亲	曾凡华(167)
逆水漫漫一叶舟	朱 晴(172)
作家简介	(182)



远去了,母亲放飞的手

■刘心武

在内心的感情上,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,然而尖锐的冲突。

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,单方面的痛怨。母亲在世时,我从未向她吐露过。直到写这篇文章前,我也未曾向其他最亲近的人诉说过。

1



1988年仲春,我曾应邀赴港,参加《大公报》创办50周年的报庆活动。其间,我去拜访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。我们是作为文友而交往的。他不但喜爱文学,而且也出版过文学论著。当然他的本职是算命、看风水。据说海内外若干政界、商界名流都找他看过相。他也给普通人看相,但要提前很久预约。我另一年过港去找他,他正在接待一对普通的夫妇,他们是来给两岁的孩子看相的,而他们的预约,却是在将近3年前——孩子母亲刚刚怀孕不久时。1988年那回,我们见面时,他不仅给我算了后半生的总走势,还给我列出了流年命势,近5年内还精确到月。至少到目前为止,他的预言,竟都一一应验。这且不去说它。最让我听后心旌摇曳的,是他郑重地说:“你这一生中,往往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,你是笼罩在母亲的强烈而又无形的影响之中;相对而言,你父亲对你却没多么大的影响。”他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“俄狄浦斯情结”(所谓“恋母弑父情结”)吗?这位命相家朋友,他的命学资源,是中西合璧的,单告诉你,他说得最流利的语言,除了粤语,便是法语,其次是英语,书房里堆满了哲学

书,包括外文的,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“江湖术士”者流,因此他对我说这话,显然也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弗洛伊德学说。他确是一语中的,我的心在颤抖中大声地应和着:是的。也许我并不是那么情愿,但每当我在生活的关口,要作出重要的抉择时,母亲的“磁场”,便强烈地作用于我,令我情不自禁地迈出步去。

2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,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。但也仅是“到此为止”。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,以全身心书写的那本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,产生出一种类似嫉妒与怅惘的心情。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,不管相互间爱极也能生怨,她们总算是相依为命,濡沫终老,一个去了,另一个在这人世上,用整整一厚本书,为她立下一座丰碑。去者地下有知,该是怎样地欣悦!

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,因为还有父亲,有兄姊,他们都很疼爱我,所以,我在浑噩中,往往就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爱,“最疼我”的也许确是母亲,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“最”字横亘心中。

1942年,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,母亲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生下了我,当时父亲在重庆,因为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,所以母亲生下我不久,便依父亲来信所嘱,带着我兄姊们回到偏僻的老家——安岳县——去“逃难”,直到抗战胜利,父亲才把母亲和我们接回重庆生活。雾都重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形成了一个模糊而浪漫的剪影。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忆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。从1950年到1959年,我8岁到17岁。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一个国家机关工作,他去农村参加了一年土改,后来又常出差,再后来他不大出差,但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,他都是早出晚归,并且我的哥哥姐姐们或本来就已在外地,或也陆续地离家独立生活,家里,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。

回忆那10年的生活,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,



都是非同寻常的。

物质上，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，对我亦然，反正有得穿，不至于太糟糕，冬天不至于冻着也就行了；用的，如家具，跟领导们比，实在是毋乃太粗陋。但在吃上，那可就非同小可了，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，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，令父亲的朋友们——都是些见过大世面、吃过高级宴席的人——交口称誉，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、腊肉、卤肉、泡菜、水豆豉、赖汤元、肉粽子、皮蛋、咸蛋、醪糟、肉松、白斩鸡、樟茶鸭、扣肉、米粉肉……等“常备菜”，那色、香、味也是无可挑剔，绝对引人垂涎三尺的。而我在那10年里，天天所吃的，都是母亲制做的这类美味佳肴。母亲总是让我“嘿起吃”（四川话，意即放开胃吃个够）。父亲单位远，中午不能回来吃，晚上也并不都回来吃，所以平时母亲简直就是为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外不厌烦地制作美味。有的了解我家这一情况的人，老早就对我发出过警告：“你将来离开了家，看你怎么吃得惯啊！”但我那时懵懵懂懂，并不曾去设想过“将来”。生活也许能就那么延续下去吧？“妈！我想吃豆瓣鱼！想喝腊肉豆瓣酸菜汤！”于是，我坐到晚餐桌前，便必然会有这两样“也不过是家常菜”的美味……那时我恍惚觉得这在我属于天经地义。附带说一句，与此相对应的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，我自己要钱买零食，她也是很舍不得给的，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、综果条、关东糖……之类的零食，她虽不至于没收，却总是要数落我一顿。母亲坚信，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，便可健康长寿，并且那话里话外，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：人只有吃“正经饭”才行得正，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——当然很多年后，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，整理为这样的文句。

母亲在“饲养”我饭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，被一致地指认为是对我的“娇惯”和“溺爱”。但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。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机关大院里，我家厨房里飘



出的气味,以及母亲经常在厨房外晾晒自制腊肠,等等形迹,固然很容易引起人们注意,而各家的邮件,特别是所订的报刊,都需要从传达室过,如果成为一个邮件大户,当然就更难逃脱人们的关注与议论,令邻居们大为惊讶的是,所订报刊最多的,是我家——如果那都是我父亲订的,当然也不稀奇,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《人民日报》,其余的竟都是我订的,上小学和初中时,是《儿童时代》、《少年文艺》、《连环画报》、《新少年报》、《中学生》、《知识就是力量》……上高中时,则是《文艺学习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新观察》、《译文》、《大众电影》、《戏剧报》……乃至《收获》与《读书》。那样多的报刊,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,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:“你怎么那么舍得一个么儿子花这么多钱啊!你看你,自己穿得这么破旧,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!”母亲回答得很坦然:“他喜欢啊!这个爱好,尽着他吧!”其实邻居们还只注意到了订阅报刊上的投资,他们哪里知道,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,还有我上高中后,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,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从1955年到1959年,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,还有在南池子中苏友协礼堂对外卖票放映的苏联原版片(像《雁南飞》、《第四十一》就都是在那里看到的)。又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,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个剧目都看了。为什么我要把这方面的投资都算在母亲身上?因为我家的钱虽都来自父亲所挣的工资(他当时是行政12级,工资额算高的),可是钱却都由母亲支配。父亲忙于他的工作,并且他有他的一个世界,他简直不怎么过问我的事,有一回我中学班主任来我家访问,他竟问人家我是在哪一所中学上学。母亲全权操办我的一切事宜。因此,如果母亲不在我的文艺爱好上,如同饭菜上那样“纵容”与“溺爱”,我当年岂能汲取到那么多(当然也颇杂芜)的文化滋养呢?

就在母亲那样的养育下,我身体很快地早熟,并且我的心态也很快膨胀起来——我爱好文学,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只是个“文



学青年”，只应尝试着给报刊的“新苗”一类栏目投习作，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、煞有介事地胡乱给一些很高档的报刊寄起稿件来，不消说，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，但竟终于在1958年，我16岁上高二时，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——《谈〈第四十一〉》。

在我来说，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。在我母亲来说呢？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”，难道她不欣喜若狂吗？

不。母亲或许也欢喜，但那欢喜的程度，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成绩一类的常事。

母亲1988年病逝于成都。她遗下一摞日记，1958年是单独的，厚厚的一本，几乎每天没有间断，里面充满许多我家的琐事细节。我找来找去，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铅字这桩在我来说是“天大的一事”，她硬是只字未提。

我的母亲是个平凡之极的母亲，但她那平凡中又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之处。

她对我的那份爱，我在很久之后，都并不能真正悟透。

3

1959年，我在高考时失利。后来证实，那并非是我没有考好，而是另有缘故，那里面包括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，这里且不去说。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录取，勉强强地去报了到。我感到“不幸中的万幸”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，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——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。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，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，但那里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进步，家庭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，几乎天天跑回家去，放弃学校的伙食，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。

我满以为，母亲会纵容我“依然故我”地那样生活。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，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，并且也



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——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，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。我服从了，心里却十分地别扭。

那时，经历过浮夸的“大跃进”，国家进入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学校里的伙食可想而知，油水奇缺；母亲在家虽也渐渐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但父亲靠级别终究还有一些食油和黄豆之类的特殊供应，加以母亲常能“化腐朽为神奇”，比如说把北方人往往丢弃的鱼头、猪肠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；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，那饭菜依然堪称美味佳肴，这样再回到学校食堂，便更感饥肠难畅。

母亲不仅把我“推”到了学校，而且，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，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，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，平心而论，一般的书藏量颇丰，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入了迷，几个月后，我也就习惯乐于在图书馆里消磨，逢到周末，并不回家，星期日竟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，也出现过几次。

不过，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，在同学中，跟他们家里所给的比，还是属于多的。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，显得颇为富有，有时就买些伊拉克蜜枣（那是当时市面上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），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。

1960年春天，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，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，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……果不其然，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，母亲也随他去。我呢？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，我应当留在北京。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，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，问题在于：北京的这个家，具体地说，我们的这个宿舍，要不要给我留下？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，那么，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？

那一年，父亲他们机关奉命调去张家口的还有另外几位，其中有的，就仅是自己去，老伴并不跟去，北京的住房，当然也就保留。很多年后，还经历了“文革”的动乱，但到头来，人家北京有根，终究还是“叶落归根”了。那时，即使我的母亲跟父亲去了张



家口,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,是会被应允的,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,母亲呢,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,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,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。

在我家,在我的问题上,母亲是绝对的权威。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,父亲是不会反对的。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。特别是,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,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都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,她却忽然陷我于“无立锥之地”,这还算得上慈母吗?!

父母迁离北京、去往张家口那天,因为不是星期日,我都没去送行,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。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,我忽然意识到,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,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!我爬上去,躺到那铺位上,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块污渍,没有流泪,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,难以言说,也无人可诉。

那一天,我还没满 18 岁。

4

我想一定会有人笑话我:十七八岁开始独立的人生,这有什么稀奇!在 1949 年以前的岁月里,有的人 15 岁左右就参加革命了!而“文革”当中,多少青年人上山下乡,“老三届”里最小的一批(“老初一”),他们去插队或去兵团时顶多 16 岁。是的,我也曾在心底里检讨过自己的娇懦与卑琐,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阶段的心曲。但现在时过境迁,我已年过半百,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炼,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,因之能以冷静地跳出自己,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入青年,那一人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,现在更能从中悟出,父母,特别是母亲,对子女,特别是对我,无形中所体现出的那一份宝贵的爱。

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。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又往往可以从大体上来归类。在 1948 年以前的年代里,



很多青年人参加革命,或是因为家里穷得没饭吃,或者是家里小康或大富,自己却觉得窒闷,因而主动投入革命,离家奋飞。而“文革”中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,他们的离家上山下乡,是处于一种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还是混沌的状态,总之要随风而去的潮流之中。但是在相对来说不仅小康而且亲情浓冽的家庭里,在相对来说属于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,一般来说,父母就很容易因为娇惯与溺爱子女,而忽略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,甚至于到了该将他们“放飞”的时候,还不能毅然地将他们撒出家去,让他们张开翅膀,开始相对独立的人生途程。80年代以来,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都面临到这样一个看似简单,实际却并不那么简单的问题,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心性发育滞后的青少年,引发于社会,则呈现出越来越具负面影响的若干伦理问题、道德问题、社会生态平衡问题与民族素质衍化等一系列问题。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环境中,我才突然觉得,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,来加深对我母亲的某些方面的理解,会不仅对我自己,对我的儿子,能有新的启迪,并且将其写出,也许会对90年代的母亲们,亦不无参考价值。

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,只是没有像张洁那样,专门写成一本书。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,她的宽于待人,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,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那样地迟慢,还有她对《红楼梦》中人物与细节的如数家珍,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日记,她曾在一篇日记里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全家的颐和园之游:“归来时,已万家灯火矣!”这在外人看来一定觉得极为平常的文句,在偷看它的我(那时11岁)来说,却经历了一次情感与诗意的洗礼……

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,不可能有相依为命、携手人生的喟叹,不是因为家贫难养,不是因为 I 厌倦了父母的家要“冲破



牢笼”(我的情绪恰恰相反),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母“断脐”(固然那时阶级斗争的弦已越绷越紧,却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起码是“适当地靠父母”,比如说在父母离京时为我谋得“留房”),而是因为父母一致认为,特别是母亲的“义无反顾”,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,飞向社会,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,从自己养活到自己筑窝,自己去娶妻生子,去开创自己的另一世界。

父母对待我们每一个子女,都是这样。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,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,学造纸,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,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,姐姐也是一样。总之,我们全都在20岁前,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。在后来的岁月里,我们在假期,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,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,我们的亲情,不因社会的动荡、世事的变迁而有丝毫的减退,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,在遇到困难时,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,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。比如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,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,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僻远的家乡居住,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,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,以补助我们的生活,那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,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“养孙子”,对我,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?

可是父母,特别是母亲,在“子女大了各自飞”这一点上,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。我的的小哥哥,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,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,说得了肺结核。当时父亲出差在外,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,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,把他接回北京治疗,竭尽心力地让他康复。在那期间,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,病愈后,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,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,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,一旦小燕伤好,仍是放飞没商量,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,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



遥远,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,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,但母亲心安理得。

母亲可以离开子女,却不能离开父亲,除了抗日战争期间,因“逃难”,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,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,始终厮守不弃。1960年,父亲调到张家口,那是“口外”,其艰苦可想而知,有人劝母亲,留在北京吧,政策未必不允,而且,过些年父亲也就该退休,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,何况北京有我,师专毕业,分配都在北京,正好母子相依,岂不面面俱到?母亲却绝无一分钟的动摇。她一听到调令,便着手收拾家当。她随父亲到了塞外,在那里经历了“文革”的洗礼,其间该军校所有教员一律下放湖北干校,就有某些随军家属,提出自己有独立的户口,并非军校工作人员,要留下来安家,经动员无效,也只好安排,这样后来军校彻底“砸烂”时,一些教职工,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属那里,生活条件较为改善,但我母亲照例绝不作此考虑,她又是连一分钟的迟疑也不曾有,坦然地随父亲上了“闷子车”,一路席地而坐,被运到了湖北干校……对于母亲来说,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,无论遇到什么情况,也无论哪怕是暂短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“好处”,她都绝不考虑,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,还是刀山火海,只要一息尚存,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,在每个可能的日夜。这是封建的“嫁夫随夫”思想吗?这是“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”吗?或许,这仿佛劳燕双飞,是一种优美的本能。

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,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,相合来看,现在我意识到,这样的母亲,确实很不简单。或者,换个说法: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母亲,但,起码在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里,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。以我的“政治嗅觉”,直到1966年春天,我还是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急风暴雨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迫在眉睫。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,当时不到24岁,却已经有了近5年的教龄,教学于我颇有驾轻就熟之感。

中学是一个很小的天地,那时离政治旋涡中心很远,我除了教